



探访八义窑

□ 老土

古窑不知年，八义彩瓷天。

那天早晨去八义镇，寻了上党区名吃——“荫城猪汤”当作早餐。从名字判断，无非就是用猪肉制作的一种汤类食物，与豆腐脑、胡辣汤、羊汤相比，大概只是食材与味道上的差别。结果喝起来一碗不过瘾，又加一碗。

荫城猪汤属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师傅为我盛猪汤时，用的就是普通的粗瓷大碗。他扎着围巾，头戴白色厨师帽坐在汤锅前，左手执碗，右手一边从几个盆里分别往碗里夹肉，一边问食客要肥些还是瘦些。然后，又加了葱花之类的佐料，用锅里的骨汤反复浇淋几遍，递给食客。一碗骨汤里，有半碗猪心、猪肝、猪肚、猪头肉之类的肉丝。汤汁洁白，清香不腻，再搭配当地葱丝薄饼或特制的火烧，堪称人间美味。

朋友说，这家猪汤店开了几十年，每天早上4时开门营业，上午9时左右售完关门。早上排队喝猪汤，是当地人们的一种习惯，也成为上党区一景。

八义镇名字的由来，包括荫城猪汤，都与战国时期发生在这里的“长平之战”有关。秦国与赵国开战，赵国国君启用赵括，替代了名将廉颇。赵括一意孤行，接连几次战役失败后，仍然继续出兵高平。部队经过此地，镇上以史柱为首的八位义士，拦住大军，劝说赵括退兵。赵括不听劝谏，以动摇军心的罪名，将八位义士斩杀。义士就义后，百姓为了纪念他们，便将此地取名八义。

上党县志记载，八义镇的八义窑，早在北宋初期就已兴起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国家考古专家，在这里发现了一百多座古窑遗址，还首次出土了宋代红绿彩瓷。当时专家认定，古窑建窑

年代虽无从考证，却远超县志上所记载时间。彩瓷的出现，具有划时代意义，同时证明，在宋金时代，这里的彩瓷技艺已相当成熟。

长治一位文化学者讲，其实这里的制陶烧瓷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人们就是依靠世代相传的烧瓷技艺，得以生息繁衍。老的土砖窑烧坏了，就在别处重新选址重建，积年累月，摒弃的旧窑越来越多，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尘埃里。

陶是瓷的前身，没有陶，就没有瓷。从陶到瓷，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演变过程。商代的陶瓷工艺，有了较大提高，出现了比陶器更细腻坚硬的青釉器。东汉三国至南北朝，瓷器釉面无裂纹，釉色淡青，胎质细白，胎釉结合牢固，基本达到了现代瓷器的要求，也标志着瓷器在中国正式诞生。

走进八义窑彩瓷博物馆，就走进了一个辉煌的年代。“先有八义窑，后有景德镇”的底气，就是因为在上党区首次发现了“红绿彩瓷”。宋代名窑很多，汝、官、哥、定、均，都各有其独特魅力。而八义窑的“红绿彩瓷”，则应该是当地制陶工匠们，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一点点探索创造出来的。宋金时期，八义窑首创“二次烧成”的釉上彩工艺，诞生的红绿彩瓷，直接影响了五彩、斗彩和粉彩的发展。

山西自古有“南路北汾”之说，几千年前，这里就有了成熟的酿酒业。后来有人走出太行，去外面闯荡时，把自己的酿酒技术带了出去。八义窑的工匠师傅们也一样，是他们将红绿彩瓷工艺带到了江西，才让景德镇陶瓷焕发出别样的色彩。

“上党从来天下脊”。无数的山西人，在千百年的岁月里，挺起了担负天

下的脊梁。文化是流动与交融的美，不同地域文化在深度的融合与碰撞中，迸发出不一样的色彩与火花。“红绿彩瓷出八义”已成定论，被陶瓷界称为“中国陶瓷史上的第一抹彩虹”。

历史，如八义镇的彩瓷，总是在平静无声地述说着。

一款“凤戏牡丹”的红绿彩花鸟纹盘，进入了我的视线。我走近它，审视它，而它神采不减，光彩照人，也在用来自宋代的眼神，默默地注视着我。“描红填绿”是它的工艺特点，红颜料勾边，绿颜料铺地，再用黄颜料过度，史称“宋加彩”，是中国陶瓷彩绘五彩的前身。这个出自八义窑的纹盘，寓意万物欣荣，四海同春。

金代“仕女戏鸚”红绿彩仕女图纹折沿盘，不知是在一场怎样的动荡中破碎了。好在，它一块也不少，被古瓷修复专家重新粘合起来。盘中红绿彩的仕女，在拼粘复活后，向人们讲述着金代和南宋的世风民俗。古代仕女高雅的生活情趣，在这个瓷盘上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。

历史就像古陶瓷碎片，再高明的修复师，也无法把它完整地粘好。它所能呈现的，永远是整部历史的一小部分。

就像这个盘子，包括前面那款“宋加彩”的纹盘，以及后面看到的几款八义窑宋代白底黑花的仕女瓷枕，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器物。如若回到宋代，如我等草民，恐怕连见一见这等器物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虎虎生威”“虎上卧虎”“如虎添翼”等一个个八义窑黄底黑花瓷虎枕，体现了古代登峰造极的绘画与完美的陶瓷制作艺术。朋友说，古代什么身份

的人，枕什么样的枕头，有严格规定。这些虎枕，要么属于贵族家庭的主人，要么属于带兵打仗的将领。

而另一款文人专用的白瓷枕，正面对秀美的行草，题了一句小诗：“落日孤村远，寒烟去路迷。”古代的文人，还真是讲究，连睡觉都要枕着诗意入眠。同样，这样一款瓷枕，也绝不是一般文人可以拥有的，它甚至可能是当年某位著名诗人的私人订制。

在偌大的八义窑彩瓷博物馆里，惊叹于古代陶瓷工匠技艺的同时，似乎也领略了一遍中华文明史。中国的陶瓷工艺进步史，就是一部华夏发展史。历史幕布后，是无数普通的黎民百姓。就像这精美的八义窑彩瓷，制作它们的工匠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恐怕都不配拥有一件他们亲手制作的瓷器。精美的作品，无非是工匠用来换取自己和家人的几日温饱。而真正的艺术，不就是在他们手中创造出来的吗？

走进八义窑的彩绘工坊，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工艺大师们，正在用画笔蘸着各种颜料，在一件件瓷器上描绘着釉下或釉上的图案。一件比较大的纯手工陶瓷工艺品，他们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间，才能绘制完成。然后再回炉，经历高温烧制，将美丽铸就成永恒。我知道，这是绝对的世间美物，也必然装点起现代人的家居生活，或者成为品质生活中的高档器具。

从八义古镇出来，看着路上形形色色的行人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他们当中的哪一个。大概就是清晨排着长队，吃上一碗荫城猪汤就心满意足的百姓之一。因为，只有端着那粗瓷老碗，吃着几元一碗的猪汤，才能写意出这满满的人间烟火。

“压寨夫人”系“夹寨夫人”讹传

□ 郭安廷

在戏曲或古典小说中，每当提到占山为王的头领妻子，往往称其为压寨夫人。大约过去占山为王的土匪基本都是男人，为首的大王如果没有夫人，人心不稳，日子不长，所以就称大王的夫人称为压寨夫人，意思是有了压寨夫人，山寨就巩固了。在这里，“压”的含义相当于“镇”。

也许很多人想不到，如果追根溯源，“压寨夫人”的称呼来自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夹寨（三垂冈）之战，而且和今天的南垂村有着不得不说的渊源。

唐朝末年，因社会矛盾激化、贫富差距扩大、官僚腐败等原因，最终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史称黄巢起义。在平定黄巢起义中逐渐起家的唐朝宣武军（总部在汴州，即今河南开封）节度使朱温，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，终于羽翼丰满，遂于唐天佑四年（907年）逼迫唐朝最后一位皇帝禅位于他。朱温原本是唐朝任命的梁王，所以受“禅”后就立国号为梁，史称后梁。

朱温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，但

原来的少数唐朝旧臣，如河东节度使、晋王李克用，南面的淮南节度使、弘农王杨渥，西面的凤翔节度使、岐王李茂贞，东面的西川节度使、蜀王王建等，都拒绝接受朱温“领导”，而是坚持用大唐的年号。对于那些不接受领导，甚至公开叫板的藩镇，朱温认为：王建远在西川，杨渥地处江南，边陲荒蛮之地，千里之外，虚张声势罢了；李茂贞区区凤翔，兵微将寡，更不足道。所堪虑者，唯和自己一起在平定黄巢起义中起家的晋王李克用一人而已。因此，把打击的重点指向了河东，梁晋两军一度对峙于双方地域边界所在的潞州即今长治市。

然而，就在梁军为潞州构筑夹寨工事时，远在晋阳的晋王李克用由于积劳成疾，于后梁开平二年（公元908年）2月去世，时年24岁的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接替晋王位。李存勖按照父王的遗诏办完丧事后，决定奇袭潞州城外的梁军，打朱温一个措手不及。这年4月24日，晋军在晋阳城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

阅军仪式，然后采用昼夜急行军的方式，用5天时间赶到了潞州北郊的黄碾镇。5月1日子时，李存勖安排晋军埋伏于三垂冈，并于鸡鸣之前趁梁军士兵熟睡之际发起进攻。一时间潞州城外火光冲天，梁军苦心经营的十里夹寨工事土崩瓦解……“五月辛未朔，晋王伏兵三垂冈下。诘旦，大雾，进兵直抵夹寨。梁军无斥侯，不意晋兵之至，将士尚未起，军中惊忧。晋王命周德威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，德威攻西北隅，嗣源攻东北隅，填堑烧寨，鼓噪而入。梁兵大溃，南走。招讨（副）使符道昭马倒，为晋人所杀”《资治通鉴》（卷第二百六十六·后梁纪一）。

晋梁之战，晋军大获全胜，声威大振，史称夹寨之战或三垂冈之战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李存勖不仅取得了胜利，而且还抱得美人归，在今南垂村的梁军营寨里，将梁军招讨副使符道昭之妻侯氏纳入自己的帐中。起初李存勖没有给侯氏正式名份，但对她十分宠爱。为不引人注意，李存勖安排侯氏女扮男装，

还用了假名。由于侯氏和李存勖是在潞州夹寨之战后在一起的，因此晋王宫中女人当面称侯氏为“夫人”，背后又称其为“夹寨夫人”。（清·乾隆）《潞安府志》（卷三十九·杂记·后唐）载：“（后唐）庄宗攻梁军于夹城，得符道昭妻侯氏，宠专诸宫，宫中谓之夹寨夫人。”

到了元代时，剧作家王实甫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戏曲杂剧作品之一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，就是大家熟知的《西厢记》。也正是在这部戏曲中，最早出现了文字上的“压寨夫人”这个称呼。

清代学者翟灏认为，“压寨夫人”的称呼来源于“夹寨夫人”。他在著作《通俗编》（卷二十二·妇女）中记载：“《五代史·唐家人传》：庄宗攻梁军于夹城，得符道昭妻子侯氏，宠专诸宫，宫中谓之夹寨夫人。庄宗出兵四方，常以侯氏从。按：近时小说所云压寨夫人者，前无所闻，似即夹寨之讹”。翟灏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，“压寨夫人”一词就是“夹寨夫人”以讹传讹的结果。